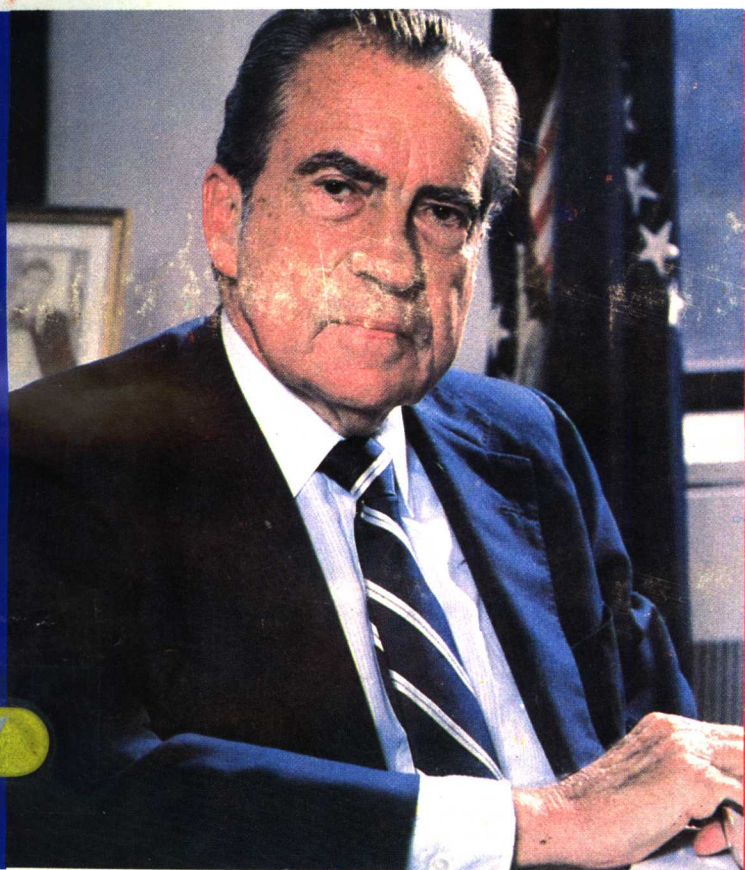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1999

不战而胜 [美] 理查德·尼克松著



上海三联书店

1999：不战而胜

RICHARD NIXON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8.

根据美国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桑吉芳

1999：不战而胜

〔美〕理查得·尼克松著

杨鲁军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30,000

印数：1—20000

ISBN7-5426-0165-2/D·3

定价：3.75元

目 录

1	最残忍的与最美好的	1
2	超级大国	14
3	如何威慑莫斯科	56
4	如何与莫斯科竞争	89
5	如何与莫斯科谈判	154
6	解体的巨人	190
7	难以驾驭的巨人	215
8	醒来的巨人	234
9	在第三世界战场上	258
10	新美国	296
	作者后记	319
	译后记	321



最残忍的与最美好的

再过 12 年，我们将迎来一个千年一遇的日子——它是新的一年、新的 100 年和新的 1000 年的开始。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人类面临的选择，将不仅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生存下去，以享受未来的时光。

1000 年以前，文明世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面对新的千年之开端的。那些求助于《圣经》预言书的宗教领袖们，曾经预言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在 1000 年时，他们担心上帝的力量会摧毁这个世界。而在 2000 年，危险却是人类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加以阻止。

到 1999 年，我们将把 20 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和最美好的世纪加以回顾。在本世纪的 130 次战争中，1.2 亿人惨遭屠戮——这个数字超过了 1900 年以前在所有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然而，在过去的同一个 100 年中，技术和物质的进步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20 世纪将被作为一个战争

和奇迹的世纪得到回顾。我们必须使 21 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

就死于战争的人数而言,20世纪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世纪;就和平时期的进步而言,20世纪是历史上最卓越的世纪。两次战争席卷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陆,但是,医学进步却使大量的疾病从地球上销声匿迹。20世纪中死于战争的人数超过了以往所有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但是,作为防止饥荒的农业进步的结果,20世纪幸存下来的人超过了以往历史上所有死于饥饿的人数。

在 19 世纪末,有人曾经认为技术和物质的进步已经达到极限,因此,人类必须厉行节约,我们要学会在一个没有增长的世界里生活。

——1876 年,一家波士顿报纸在一篇关于电话问题的编者评论中断言:“有识之士都知道,通过电线来传递声音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

——1878年,在一个世界科学博览会上,一位英国教授在对电灯进行检测之后,评论道:“当巴黎展览会闭幕时,电灯也就随之熄灭了,没有人再会提及它。”

——1897 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宣称:“无线电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20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专员查尔斯·H·迪尤尔强烈要求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撤销专利局,他认为:“所有人类能够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

然而,仅仅是从 1899 年迪尤尔发表上述声明以来,美国已有 400 多万项专利获得批准。

所有关于时代极限的观点都是缺乏远见和愚蠢的。世界并没有在停滞中沉沦,恰恰相反,它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了

亘古未有的成就。人类创新的激增已经成为 20 世纪的主要特征；数以百计的、在上一世纪末甚至都难以想象的发明，已经对本世纪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但是，世界人口将从 1900 年的 12 亿增长到 1999 年预计的 62 亿。仅仅是在三个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减少的。20 世纪的人口爆炸是人类在医学和农业这两个领域里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结果。

人类在卫生保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前所有世纪的总和。像肺结核、天花这些曾经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疾病，现在都已被消灭。1900 年，美国婴儿死亡数是每 1000 人中有 162 人死亡。到 1999 年，这个数字据预测是每 1000 人中只有 14 人死亡。仅仅是在 250 年以前，英国的安妮女王在生下三个孩子之后却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这些孩子在他们未满 10 岁的时候就都夭折了。

在 20 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生产比粮食生产增长更快的悲观预测，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在本世纪初，美国有 40%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现在，以不到 2% 的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就不仅足以满足 2.3 亿美国人的消费，而且还成百万吨地向国外出口。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数百年来曾饱受饥荒之患的、在近代以前早已被专家们绝望地判处死刑的国家，现在所生产的粮食，也足以满足他们本国人民的消费——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将近 20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1/3。

医学和农业的革命使人类的估计寿命大大增加。1900 年，美国人的估计寿命是 47 岁；1984 年，增至 72 岁；到 1999 年，将达到 75 岁。如果这个数字以现在这样的速度继续增长的话，下一个世纪最后一年出生的人的估计寿命将高达 101 岁。

20世纪还将被作为这样一个世纪得到回顾——在这个世纪中,汽车取代了马车;飞机开始飞翔在火车的上空;电话代替了电报;无线电、电影和电视导致了通讯革命;人类开创了计算机的时代,并登上了月球。

1900年,人们坐轮船和火车作环球旅行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1950年,人们乘用螺旋桨启动的飞机作同样的旅行只需4天;1980年,人们乘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环球一周仅需24小时。到1999年,当飞机能够飞出大气层并能够返回的时候,人类环球一周所需的时间,将以分钟来计算。

在本世纪中,主要的新闻媒介从印刷物转变为广播,再转变为电视。如果说,一个独裁者使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并控制本国人民所接受的全部信息,这在过去还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外的无线电广播今天已经跨越了国界;到1999年,电视通过卫星的直接传播也将跨越国界。

就物质进步而言,20世纪是历史上最好的世纪,但是,就政治进步而言,20世纪却是令人失望的世纪。

技术革命对人类的最大启示是,人类自身产生的问题只有依靠人类自身来解决。技术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下一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我们必须改变那种对新技术始而惊羨、继而享受的状况,致力于运用新技术来克服那些皈依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将是永远存在的。

纵观历史,人类从来没有像20世纪那样,对于为什么要打仗、打仗要解决什么问题,误解甚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H.G. 韦尔斯写道:“人类历史愈益成为一种教育与灾祸之间的竞争。”韦尔斯希冀仅仅靠知识来创造一个更加

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德国人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以前，曾受过最良好的教育；日本人则是地球上最有文化的民族。

伍德罗·威尔逊曾经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消灭专制主义政府，保障世界的民主和安全。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这三个独裁政权，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取消了专制。但是，它却极大地强化了第四个专制政权——苏联。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莫斯科现在在军事上比柏林、罗马、东京这三个以前的专制政权的总和还要强大——它对自由与和平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葬送了君主专制政体和殖民主义，但是它们并没有把议会制的民主政体宏扬于整个世界。20世纪伊始，世界上11%的人生活在民主国家，20%的人处在专制君主国的统治之下，69%的人集中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今天，世界上只有16%的人生活在安定的民主国家；而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地下阴谋组织的极权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却统治着世界人口的35%以上；剩下的49%的人口则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独裁国家或不安定的民主国家。看来，当一些国家取得进步的时候，更多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倒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如以前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末日的开始；它使美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一变革受到了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庆贺，但是，无情的现实是，这些独立国家的人民现在的生活境况，比欧洲人统治他们的时候还要糟糕，甚至还不如殖民主义者进入他们国家以前的时候。在许多国家，一种新的、更险恶的殖民主义已经取代了旧殖民主义。东欧、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在形式上已经独立，但它们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

上却又完全为苏联所控制。从整体来看，它们在政治上和苏联是不平等的。20 世纪的最重要的变化，不是殖民主义的终结或者民主主义的发展，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壮大。

从正面来看，20 世纪目睹了极权主义政府的表面民主的胜利，如果它不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的话。但是，要求民主，却几乎是一种全球性的愿望——连那些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有自由选举的要求。这种民主冲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极权国家自身的性质。独裁者以往总是宣称对人民实行统治是他们的权力。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独裁者都标榜自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管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绝大多数共产主义极权国家都称自己是“民主共和国”。

到1999年，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军事力量和物质进步方面的成就，使它在提高政治技巧、发展保卫和平的机构和技术成果资本化方面的成就大大降低了。到21世纪，我们的任务将是结束我们的技术技能和不幸滞后的政治技能之间的增长不匹配的状况。

将原子能的威力释放出来，是20世纪最可怕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只有3枚原子弹，其他国家1枚也没有。但在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却拥有5万枚以上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威力绝大多数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毁灭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的威力。

尽管人类在本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时下对于它的前途的看法却是普遍消极的。一些专家认为，这是核战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仍在游荡的结果——它正在使我们孩子的性情变得乖戾；它正在扭曲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它正在从情感上和心理上将现代人变成麻木不仁的怪物。这些专家指出，人类头上高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使每一个人都变成

了妄想狂。

但是，创造了核武器的人类智慧同时又创造了青霉素和航天飞机；有些人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后者是“美好”的，前者则是“罪恶”的，尽管两者都是技术进步的产物。然而，比照之下，这种想法不啻是一种错觉。我们的观察表明，所谓核武器是“罪恶”的，这不过是一种自我鞭挞的非理性的例证而已。真正罪恶的是战争。核武器终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已经成为用来防止以常规武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从而使千百万人免于丧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核武器不会消失；在我们有生之年也决不可能出现可与之抗衡的完备的新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核武器时代生活，否则，我们就将遭受核武器带给我们的灭顶之灾。

核武器并非必然给我们带来毁灭。但是，如果我们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纠缠不清，以致于不能很好地解决东西方的政治分歧——不论核武器存在与否，这种分歧都将导致战争——那么，核武器终将导致人类的毁灭。

20世纪已经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和最伟大的进步。在这100年中，人类的巨大破坏力和巨大创造力都是史无前例的。42年前，温斯顿·邱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讲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说，“当石器时代的野蛮和残忍借助闪烁发光的科学之翼重返现代社会时，曾经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的科学技术，将会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那么，在下一个世纪，人类的命运将如何呢？美国是自由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它应对人类命运的抉择负主要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责任却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承担的。无论从哪一个实际生活指标来看，美国人的日子从来没有过

得像今天这样好；他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了，饮食和居住条件更好了；他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了，挣的钱也更多了。但是，他们的目标意识却减少了。一个世纪以前，当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美国在扩展之中的时候，美国人对“命定说”^{*}笃信不疑；虽然美国人的潜能受到了疾病和贫困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不受限制的。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不再受贫困的折磨，但是我们在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价值进行事后评价方面所浪费的潜在的创造力，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美国不在国际社会起中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却是一个使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的事实。正像安德烈·马洛克斯曾对我说的的那样，“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不刻意追求世界强国地位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领导自由世界，那就不会有可以被领导的自由世界。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领导自由世界的任务已经落在了美国的身上。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有人宣称，这个国家的不尽完美之处意味着这个国家没有理由成为世界领袖。但是，如果美国从世界领袖的地位上退下去的话，这个位置上就会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它将成为一个慈善目的愈来愈少而模棱两可的道义允诺愈来愈多的超级大国。

越南战争的悲剧——不是指我们在越南时的处境，而是指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伤害了美国。尽管这场战争的失败，是在我们结束越南战场上的战斗的两年之后，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减少我们的痛苦。它使我们在外国朋友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它使我们在敌人眼中的威势受到了削弱。但是，

* “命定说”(Manifest Destiny)，指一种认为某一民族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的历史观。——译者注

它使我们遭受的最大损害却在国内。我们在越南的失败把我们这个很少失败的、总是把战争的胜利与正义的胜利等同起来的国家搞混了；它促进和强化了一直存在于美国人格中的孤立主义倾向；它还在我们中间造成分裂，使一些人反对我们，一些人则错误地相信，他们的政府参与了一场可耻的而不是高尚的战争。

今天常有人说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自豪感已经得到了恢复。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种恢复是在经历了几年的稳定的经济增长之后，并且是因为来自国外的绝大多数坏消息——至少是和美国有关的——都仅是比较孤立的恐怖主义事件或者波斯湾的一次偶然的小冲突；总之，许多美国人都感到，现在的情况比8年以前要好多了。

但是，没有经过逆境磨炼的民族自豪感是贫乏的；对我们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缺乏认识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没有勇气去分担我们引以为荣的国际责任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我们对于恢复自豪感的过分渲染已经无异于为自己寻找一个自鸣得意的、舒适的避风港。真正的民族自豪感并非来自于逃避冲突，而是体现于在这种冲突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斗争。

要在美国人民和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与盟国中间建立一种对美国的新的、持久的信任感，仅有几次像入侵格林纳达和袭击利比亚这样成功的、但比较小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美国人更无忧无虑和繁荣富庶了。我们的强大力量和巨大财富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上采取旨在使世界更加安全和更加美好的政策。我们在为和平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耗费的力量比历史上任何军事冲突都要大得多。如果美国不能承担起它对于世界的责任，西方就会沉沦；在下一个世纪，世界将会陷入比

本世纪更为危险和残忍的境地。

如果我们准备迎接这种挑战，我们首先必须在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问题上抛弃以往的错觉。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矛盾并非与生俱来，世界各国的人民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差异只是误解的产物；永久的、完美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这些观点。几百年来，国际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各个国家在政治传统、历史和意识形态这些基本方面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常常导致了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事实上，冲突双方对此都是非常清楚的——会导致争端，最终上升为战争。只有当这些国家接受了冲突的存在这一现实，并努力通过力量平衡来解决它们的冲突，总体上的持久和平才能实现。

那些举着呼吁“和平”和“全球性裁军”的标语牌招摇过市的人认为，消除战争危险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种由一个国际性组织来维持的世界秩序。20世纪已经打破了许多神话，但是，没有比那种认为国际性组织能够带来完美和平的神话更具有破坏性的了。

在本世纪中，国联和联合国是建立世界秩序的两大实验。但是，两者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失败。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次要求美国加入国联的讲话中声称：“国联是和平的可靠保证，是反对侵略的可靠保证。”国联成立后不到20年，世界就陷入了一场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联合国也是不无乐观的。他曾说，“这一次我们不能失去建立一种世界秩序的希望了，它能够保持和平，并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实现完美的平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120次战争，有180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一些世界上最精明能干的外交官在联合国中担任他们国家的代表。他们不可

能达成有效的一致。他们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但他们所做的都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和同情，但是，美国人不能把影响它自身利益的问题交给一个对我们抱有很大偏见的团体去处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拥有 6 辆坦克或 6 个带着一枚小炸弹的卑鄙的恐怖主义者的小国家，要比集中了其全部精华的联合国大会更有实力。影响世界变化趋势的只能是实力。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会放弃它的实力，把它交给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团体，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是一个国家不可改变的秉性。我们越早正视这一现实，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越早消除对增加国力的负罪感，以国家实力的稳定平衡为基础的真正的世界秩序就会越早建立。

世界和平与国家实力是分不开的。没有国家实力，任何外交政策上的目标，无论是战略的、地理政治的、还是人权方面的，都无法实现。如果美国的领导阶层不理解这一现实，美国将会失去成为一种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机会，因为它根本没有这种力量。

在过去的 40 年里，我访问了 90 个国家。在所有我会见过的领导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对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的理解十分广博，而且极富洞察力。我至今仍清晰地回忆起 20 年前我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他在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以意味深长的手势和引人入胜的比喻，断断续续地陈述着他的看法。他把世界比作一个大森林，里面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幼苗和葡萄植物。他说，苏联、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都是大树，其余的都是幼苗（其中有些可能会长成大树）和葡萄植物（由于其民族或资源方面的缺陷，没有希望成为大树）。

我相信,李光耀一定会赞同这一观点,即美国和苏联这两棵大树比其他树都高。在 20 世纪的最后 12 年里,我们应该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美苏关系问题上;但也不能仅限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如下 4 个方面发挥新的创造力:

第一,我们必须与苏联发展一种新的关系:双方和平共存,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应该知道,尽管美苏两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相互竞争,但两国在避免使矛盾上升为战争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第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西欧和日本应该拿出更多的、比例公平的资源,为保卫西方的整体利益作出贡献。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发展美中关系,主要是发展经济与政治合作,进而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军事与战略上的合作。

第四,我们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推动第三世界的和平、自由和繁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那些世界上政治和军事力量最弱小的国家,在未来的时代中将会发生最猛烈的、最惊人的变化。

如果我们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那么我们将面临的挑战的规模及其复杂性都是惊人的,而所获得的利益并不会更大。到 1999 年,人类走向毁灭的力量将是无限的。而人类走向进步的力量也是无限的。100 年以前,许多人认为我们在发明和进步方面已走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们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 世纪大量的科学突破,与我们在 21 世纪所能实现的突破相比,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能够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找到治疗可怕疾病的方法,以及在全世界消除饥饿的痛苦。但是,只有在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

——使 21 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一切。

1974 年，我在克里米亚半岛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面。当译员在翻译我对苏联的一个看法时，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和平就像一棵娇嫩的幼苗，必须不断地精心培育，补充养分，这样它才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对它置之不理，它就会枯萎而死。”在本世纪中，我们未能经受住这种挑战。但是，我们再也承担不起在下个世纪也同样失败的代价。

在到 20 世纪末的 12 年里，我们将设计一个 21 世纪的世界。抓住这个时机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这样，当我们在 1999 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失掉任何使下一个世纪成为文明史上最美好的而不是最残忍的 100 年的机会。

36 年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曾受到热烈欢迎，他说：“胜利是无法替代的。”他所说的是一场常规战争的胜利。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但是，胜利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苏联人在寻求没有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寻求没有胜利的和平了。我们也要寻求没有战争的胜利。但我们寻求的是另一种胜利。它不是我们对其他任何国家和人民的胜利，而是自由思想对否定自由的极权统治思想的胜利。我们寻求的是没有政治压迫的全人类人权的胜利，是消灭世界上存在的贫困、痛苦和疾病的胜利。

苏联人正在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则在为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的目标而奋斗。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有权选择由谁来领导他们，以及如何领导他们。苏联人认为历史将站在他们那一边。而我们必须保证，当人们撰写下个世纪的历史时，它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2 超级大国

差不多在 150 年前，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预见到世界的未来将操纵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美国与俄国之手：“前者的主要手段是自由，后者的主要手段是奴役”，他这样写道，并进而指出两国仅因其辽阔的疆域便注定要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们的出发点与发展之路都不同，但看来都为天意所然，被上帝选来支配半个地球的命运。”

托克维尔当时不可能考虑到 20 世纪的重要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发明或 1917 年的俄国革命（这次革命使君主专制让位于管束更严的共产主义专政）；但他在 1840 年对美、俄两国未来命运的预言却已成为今天的事实，并将继续成为 21 世纪的事实。美国与今天的苏联专政之间的鸿沟远远大于美国与 19 世纪专制的俄国之间的差距。

美国和苏联从未在战场上对垒过。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盟友。但当大战接近尾声时，托克维尔的预言就成为现实了。斯大林将苏联引向一条与世界各国为敌的道